

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

——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

任娟◎

【内容提要】 联盟政治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焦点，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从联盟维持的动力、内部凝聚力、制度化程度、联盟内部管理等视角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提升了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理论化水平和现实相关性。在《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一书中，柯庆生以联盟内部凝聚力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了联盟的内部关系对强制外交效果的影响，指出联盟内部缺乏团结和不协调会增加地区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延续。借助大量的原始档案和相关研究，作者利用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与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之间的互动来验证这一有悖常识的论断。尽管该书的案例分析侧重于冷战初期，但是为我们审视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该书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解释对理解当今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之间的互动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联盟政治 强制外交 承诺 威慑

【作者简介】 任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09renjuan@gmail.com。

《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2期（总第38期），第119—133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盟政治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焦点，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从联盟维持的动力、内部凝聚力、制度化程度、联盟内部管理等视角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提升了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理论化水平和现实相关性。当前，有关一个国家面对对手联盟时的战略选择尤其受到关注，因为这种互动关系涉及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联盟可信性等诸多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从常识角度考虑，如果对手联盟内部凝聚力强、组织有序，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变得艰难；相反，如果对手联盟内部凝聚力弱、组织涣散，对手联盟对自己的威胁就会减弱，或者应对起来就会更加容易。

然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2011年出版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以下简称《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有悖常识的观点：如果对手联盟内部缺乏团结、协调性差和产生敌意，那么一国在面对这一联盟时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威胁，自己对该联盟施展强制外交的效果会大打折扣。^① 简言之，一个分裂的对手联盟比一个团结的对手联盟更加难以应付。在提出这一核心论断的基础上，柯庆生发展出了一个将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并且借助大量原始档案和相关研究对1949—1969年东亚地区联盟政治的动力和态势做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解释。该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吉登·罗斯（Gideon Rose）等知名学者都对该书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与国际关系史专栏（H-Diplo）组织了关于该书的圆桌讨论，邀请四位冷战史和中美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短篇，柯庆生则对这些评论做了回应。^② 从学界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

^② 参见Roundtable Review of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2011),” *H-Diplo/ISSF Roundtable Reviews*, Vol. 3, No. 11, 2012, pp. 28–34。

的反响看，《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一书将理论与历史有机结合，提供了丰富而细致的案例研究材料，确实是近年来有关联盟政治的一部力作。

一 问题的提出

联盟政治是一个至少涉及三方的问题，因为联盟产生、维系和变化的动力既来自联盟与其对手之间的互动，也来自联盟内部成员的互动。因此，近年来，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衍生出了许多涉及多方互动的研究问题。比如，一个联盟在面对对手时如何进行内部管理，尤其是如何协调内部矛盾？联盟中的成员（尤其是大国）如何向对手发出可信的威慑信号以保护自己的盟友？一个国家在面对对手联盟时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分化该联盟？等等。

上述问题或多或少都牵涉强制外交这一概念，因为无论是内部管理、可信威慑以及分化对手，强制（coercion）都是最为基本的手段之一。^①而强制外交是一种综合运用威慑和承诺来影响对手行为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己方威慑的强度以及对手所感知的威胁可信性。但是，有关强制外交的既有研究通常关注双边外交，尤其是美国针对小国的强制外交问题。比如，近来的一些研究讨论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强制手段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和成效。研究发现，美国对伊朗采取强制外交的效果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的制裁壮大了伊朗国内的反对派，进一步加大了伊朗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使用武力的分歧则使得伊朗更难以屈从于美国的压力。^②正如杰维斯所告诫的那样，强制外交的成功必须依靠可信的承诺和威胁，而这种可信性需要“超常的冷静、勇气、

^① 强制外交最早由托马斯·谢林、亚历山大·乔治提出，分别见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exander L. George et al.,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Laos, Cuba, Vietnam* (Boston: Little&Brown, 1971)。

^② Graeme A. M. Davies, “Coercive Diplomacy Meets Diversionary Incentives: The Impact of US and Iranian Domestic Politics during the Bush and Obama Presidenc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3, 2012, pp. 313–331.

创造性和自制力”。^① 无论如何，有关强制外交的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或者关注双边外交中的强制行为，较少涉及联盟政治。^②

在有关联盟政治的较早研究中，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提出，联盟需要管理盟友之间的关系以及联盟对敌对国家的强制外交。^③ 斯奈德更多关注的是面对对手的强制外交时联盟内部的动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认为会陷入“牵连”和“背叛”的联盟困境。^④ 不过，如果做更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之间的关联至少提出了三方面的研究问题：第一，一个国家如何采取强制手段来应对对手联盟的威胁和压力；第二，一个联盟面对对手的强制外交如何进行内部管理，或者这种压力如何影响联盟内部关系；第三，对手联盟的内部关系如何影响强制外交的实施和成效。

《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对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或多或少都进行了探讨，柯庆生将联盟政治本身（尤其是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和成本分担方式）作为核心变量来解释强制外交的成败。在理论部分，作者借鉴了联盟困境理论和威慑理论中关于可信信号的论述；在实证部分，作者主要依据的对象是冷战初期美国对中苏同盟实行强制外交的条件和效果。作者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希望让自己的盟友负担更多的成本，同时在外交政策上追随自己的领导。然而，一国承担的责任越多，就越希望本国在政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联盟内部的中小国家会逐渐减少对领导国的依赖，这时联盟的凝聚力会趋于弱化，联盟对外发出的信号也会变得模糊，这种状况不仅会削弱联盟的威慑效果，也会削弱对手进行强制外交的努力。

① Robert Jervis, "Getting to Yes With Iran: The Challenges of Coerc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2013, p. 105.

② 虽然美国在实行强制外交时需要盟友的配合，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美国一个国家。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2 – 198, 330 – 355.

④ 对此经典论述见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 – 495.

第二，作者将意识形态因素作为背景变量，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理论结合起来——强调意识形态竞争导致联盟内部不和以及意识形态会使联盟更具有攻击性，将共产主义阵营视为修正主义同盟。在作者看来，如果联盟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声誉竞争，那么，当竞争没有公开化时，外部国家的强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当竞争变得公开化，那么外部国家的强制外交就容易成功。此外，如果联盟内部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声誉竞争，联盟中的主导国家能够有效地掌控其他成员，那么此时外部国家的强制外交也容易成功。

《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一书可以分为引言（第1章）、理论验证（第2—7章）和结论（第8章）三大部分。作者在引言部分提出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即“联盟成员之间的不团结、不协调和敌对都会增加地区冲突的发生以及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延续”。^①此外，作者还对理论框架中的两个核心变量（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即联盟内部凝聚力越高，则对该联盟实施强制外交的效果越好，反之则效果越差。在理论验证部分，作者通过考察1949—1969年东亚地区的联盟态势（第2—6章）以及1972—2009年中美之间强制外交的波折（第7章），用相关案例来验证其理论。通过回顾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和越南战争期间东亚的联盟政治和强制外交，作者论述了联盟内部的不协调和模糊信号对地区稳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该书第7章简要介绍了美国冷战联盟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影响。在最后一章中，作者阐述了其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在此，我们对作者的理论设计和案例检验这两部分进行介绍，了解该书的核心内容，从而对其所做的学术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加以评析。

二 联盟凝聚力、联盟性质与强制外交的效果

对手联盟内部的分化与不和对本国是否构成明显的战略优势？柯庆生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 1.

认为，这种不和反而增加了一国对对手实施强制外交的难度。当对手联盟出现内部竞争或分化时，其很难清晰、连贯地解读己方所发出的威慑信号，己方采取低成本强制手段实现政策目标的企图会落空。最终，联盟内部的不团结、不协调和敌对会增加地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并可能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延续。

（一）理论设计

在理论部分，柯庆生发展出了两个独立的分析框架。第一个分析框架将联盟的凝聚力作为自变量，这一变量通过威胁和承诺信号的传递，影响联盟对外界的攻击性和对手通过强制外交对其进行遏制的难度。具体而言，当对手联盟内部缺乏协调时，其成员对外行为的独立性上升，其中具有进攻性的成员可能将其他成员拖入冲突中；同时，联盟内部协调性较差也会使得该联盟不容易接收对手发出的威慑和承诺信号，由此使对手的强制外交难以实施。作者认为，“联盟内的不协调较多地出现在联盟的形成初期”。^① 在这一时期，安全联盟一般组织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安全伙伴对于对方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以及可靠性的猜疑较多，而且联盟形成之初并没有明确划分各自的责任。当联盟的最初目标改变或者联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时，协调问题会随之增加。

第二个分析框架将联盟划分为修正主义联盟和维持现状联盟。其中，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使得联盟更具有进攻性。当修正主义联盟初步形成且联盟内部成员就领导权问题存在竞争时，联盟成员所共有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会使整个联盟具有更强烈的进攻性。因此，相对于维持现状联盟或者不存在领导权竞争、等级结构分明的联盟，存在内部竞争的修正主义联盟更加难以通过强制外交来加以遏制。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 4.

联盟的修正主义 / 维持现状的性质为何会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作者认为：第一，如果联盟内部成员存在利益分歧，追求修正主义目标的国家更倾向于对外使用武力。当修正主义联盟内部缺乏明确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协调时，即使一个现状国及其盟友能够通过威慑和承诺成功制止修正主义联盟中最强的领导者，它也很难同时阻止该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因为各修正主义行为体不仅对敌人的威慑和承诺理解存在差异，也会基于国家利益、地理位置以及提升自身声誉的考虑而具有不同的偏好。第二，在联盟形成阶段，修正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需要采取行动向潜在的修正主义盟友证明它们的目标一致，而联盟的新成员会通过对共同的敌人采取进攻性行为来表达其对盟友的支持。第三，一旦修正主义联盟形成，联盟成员会为了维持它们的威望和争夺领导权而强化联盟的进攻性，从而导致对手难以用强制外交对其进行和平的遏制。^①

（二）理论检验

作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其案例基于 1949 年至 1969 年美国对东亚共产主义联盟强制外交的实践。在共产主义阵营和反共产主义阵营成立之初，各自阵营内部缺乏协调且两大阵营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导致双方对对方的严重误判并引发了一系列紧张态势。

在柯庆生看来，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协调导致其无法给美国发送出清晰可信的信号，这是美国强制外交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也给地区冲突和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作者采用了反事实推断的方法：朝鲜战争中，如果在美国越过“三八线”之前，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能够组织有序并及时在朝鲜进行军事部署，那么在美国看来，朝鲜战争升级的局面仍然可控。但是，由于当时美国与中国领导人之间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和私人关系，而且在美国仁川登陆之后、越过“三八线”之前中国也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导致美国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 5.

低估了中国干预朝鲜局势的可能性，最终导致战争的升级。^①

为了比较联盟内部协调程度的差异对地区冲突和强制外交效果的影响，作者进而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苏同盟关系。这一时期，中苏同盟内部的协调性好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员之间的配合程度明显提升，而且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等级关系，作者认为这一状况为朝鲜半岛的停火谈判提供了机会。此外，越南战争停战协定《日内瓦协议》的成功签署也被作者视为联盟内部协调性增强有利于缓解冲突的案例，作者认为这一协定之所以达成不仅是因为法、英、美三国在谈判中的共同利益促成三国乐于接受该协定，也是因为共产主义联盟尤其是越南也接受该协定。^②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内部相对团结稳定，这使得反共产主义联盟更容易通过强制外交和谈判加以遏制。而且，尽管当时越共希望领导革命实现全国统一，但是中苏两个大国此时对西方大国和非共产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和平攻势，不希望继续纠缠于与美国的战争之中。这一时期，中苏协调一致也促成了东南亚局势的缓解。所以，作者的结论是“铁板一块”的中苏同盟（或共产主义同盟）有利于促进和平谈判，阻止地区冲突的升级。^③

不过，中苏同盟的内部协调配合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1953年至1957年）。随着中苏的意识形态分裂、不信任以及中苏之间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问题产生分歧，共产主义同盟开始出现裂缝。1958年至1959年，中苏两国的关系已经非常冷淡，到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此后，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起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作者认为，中苏交恶不仅给两国带来了很大损失，同时也

^① 作者认为，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朝鲜领导人没有及时地向中苏寻求援助，而且当时中苏就苏联提供支持的条件以及苏联对参战的中国军队的空中保护都没有谈妥。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战争期间（包括苏联、中国和朝鲜在内）共产主义联盟内部缺乏足够的协调和信任。

^②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 125.

^③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p. 125–128.

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努力。^① 这是因为，中苏两国为了各自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声誉而纷纷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其中的受益者就是能够得到中国或苏联支持的越南、古巴和东德，它们可以不顾莫斯科提出的与敌人和解的建议。由此可见，“出现裂缝的铁板”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热潮，成为地区冲突爆发的助推剂。

同时，中苏分裂以及中苏在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越南共产党提供了机会，它可以在中苏两国中得到对革命的最大支持。从1954年到1965年，共产主义联盟内部的协调性、凝聚力的降低导致越南统一战争的主动权由苏联转移到胡志明政权手中。1965年至1968年初，中国反对苏联促成和平谈判的决定，支持胡志明政权通过战争实现全国统一，破坏了苏联提出的越美和平谈判建议。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至1968年，美国难以通过强制外交来促成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谈判。

作者也用其理论框架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作者看来，尽管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尤其是与中国台湾地区维持准联盟关系影响了中美邦交的恢复以及后来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在自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冷战结束期间并不明显。^② 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两国大部分时间有着反苏这一共同战略利益，强制外交不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当1991年中美两国的共同威胁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台独”问题出现后，中国开始对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军售以及与日本强化同盟关系变得敏感起来。当然，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态势，尤其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运用了强制外交手段，尽管美国反对中国不放弃武力手段的表态，但是美国也向台湾当局发出了不支持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p. 146–180.

^②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 221.

“台独”的明确信号，这一清晰可信的承诺促进了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稳定。^①

三 《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一书的贡献与不足

《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为理解冷战期间东亚地区的联盟政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康灿雄（David Kang）指出，这本著作“对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研究东亚安全的学者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价值”。^② 该书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结合起来，系统地分析了多方互动情况下联盟政治本身的动力如何影响联盟内外国家的政策及其效果，在研究议题和解释框架等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

（一）学术贡献

该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突破了现有文献的局限性，发展了一个将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联系起来的理论，并系统讨论了联盟的凝聚力对于联盟成员的行为和对手的行为，进而对于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的影响。作者找到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凝聚力与美国实行强制外交之间的有效逻辑，拓展了强制外交研究的深度，“作者在联盟政治和强制外交之间建立的联系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亚洲的冷战史，并促使我们反思美国应对中苏同盟的政策”。^③ 通过研究，作者发现联盟内部凝聚力越高、协调性越强，则越有助于对其实施强制外交、缓解地区冲突。通过考察中苏联盟的内部动态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p. 221–222.

^② David Kang, “Book Review: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1, 2012, p. 146.

^③ Reviewed by QiangZhai, Roundtable Review of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2011),” *H – Diplo/ISSF Roundtable Reviews*, Vol. 3, No. 11, 2012, p. 25.

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作者证明了其理论的有效性。

此外，该书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应对对手联盟的策略与方式。一般而言，在应对对手的联盟时，分化瓦解对手联盟是常规的途径，“面对国际政治竞争，各国在联盟政治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在面对威胁时与别国结盟，二是分化瓦解对手联盟”。^① 柯庆生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分化瓦解对手联盟的后果是什么，是否会更加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从实施强制外交的难度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对手联盟的分化增加了强制外交的难度，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于如何应对对手的联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这值得学界的关注。同时，该书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联盟内部的管理机制。^②

从方法论角度看，该书值得借鉴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首先，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的运用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假设原因 X 的发生导致了结果 Y，反事实推理就是在几乎相似的情况下设定，原因 X 不发生那么就不会产生结果 Y。所以，反事实推理的运用主要是为了通过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比较来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结果。^③ “在书中的一些论述中，作者运用了反事实推理以排除其他一些可能的解释，并说明如果当时的领导人做出其他的政策选择，那么他的理论框架仍然适用。”^④ 反事实推理有效地应对和排除了其他替代性解释。

其次，优秀的案例分析不仅需要扎实的历史知识基础，还需要逻辑严密的论证，即案例选取和论证手法两者缺一不可。该书中作者选取了冷战时期的几个热点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1954—1955 年和 1958 年

① 刘丰《联盟政治研究的进展与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6日，B03版。

② 现有对联盟管理机制的研究见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

③ Henry E. Brady, “Models of Causal Inference: Going Beyond the Neyman-Rubin-Holland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litical Methodology Group,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July 16, 2012, pp. 4–6.

④ Reviewed by Gregg Brazinsky, Roundtable Review of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2011),” p. 6.

的台海危机，通过考察中苏同盟从不协调到关系相对稳定再到分裂的过程，来说明对手联盟内部的不协调不利于己方实施成功的强制外交，最终容易导致地区冲突的爆发或升级。作者引用了大量新资料，尤其是一些近期解密的冷战时期中美苏三国的档案资料进行论证，并借鉴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政策意义上，柯庆生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启示。第一，为避免地区冲突的爆发或防止现有冲突的升级，在实行强制外交时，敌我双方之间需要保持外交渠道的畅通，并发送出关于可信的威慑和承诺信号。需要注意的是，使信号更加可信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① 比如，在朝鲜战争中，中国需要更早派出更多军队到朝鲜。从这个角度看，由可信的承诺和威慑构成的强制外交可成为冲突管理的工具。第二，联盟中的大国应该加强联盟内部管理，防止被联盟中的小国拖入与其他国家不必要的冲突中。第三，当国家在制定针对联盟的外交政策时，要根据对方联盟内部的变化灵活应对。因为“不管是共产主义阵营还是非共产主义阵营，从来没有一个联盟可以一直如‘铁板一块’般团结”。^②

（二）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作者提出了对冷战期间东亚联盟政治的独到见解，该书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作者或多或少夸大了联盟政治这一变量的因果效应，在讨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时基本忽略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在冷战前期，中苏的国内政治结构使得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在外交决策中发挥重

^① 对此理论论述见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1997, pp. 68–90;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versu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An Empirical Test of a Crisis Bargaining Model,” *Journal Of Conflict Solution*, Vol. 38, No. 2, 1994, pp. 236–269; James D. Morrow, “Alliance, Reliability, and Peacetime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2, 1994, pp. 270–297。

^② Gordon H. Chang, “Book Review: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82, No. 1, 2013, p. 165.

要作用，中苏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相互认知以及行事风格的变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讨论 1958 年的台海危机时，更多地应该考虑国内政治和国内动员的影响，而不是联盟政治因素”。^①

第二，在案例分析部分，作者虽然引用了大量资料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对历史背景的过于简化使读者在阅读时容易产生错误理解。“作者在越南问题上夸大了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且低估了这一时期两国领导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② 作者并没有提到，实际上在 1952 年 10 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和刘少奇同时促使胡志明同意在越南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苏联在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有地理因素的制约，并不完全是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因此，在案例分析部分，作者应在历史事件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之间掌握一个平衡。

第三，作者认为中苏敌对是导致美国实行遏制和威慑政策难度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样一种观点也存在疑问。实际上，冷战早期的美国决策者在评估中苏关系时，更多是倾向于夸大共产主义的整体威胁，强调共产主义扩张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不管中国、苏联和越南在观点和利益上存在的分歧，固执地将共产主义阵营视为铁板一块的威胁。”^③ 从反事实推理的角度看，如果当时美国决策者在中苏分裂早期就发现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并加以利用，那么美国就不会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反言之，美国强化对共产主义阵营的遏制正是因为决策者当时并未将中苏分歧作为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

第四，作者关于修正主义联盟与维持现状联盟的划分及其判定存在问题。

^① Reviewed by Chen Jian , Roundtable Review of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2011) ,” pp. 18 – 19.

^② Reviewed by QiangZhai , Roundtable Review of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2011) ,” p. 25.

^③ Reviewed by Gregg Brazinsky , Roundtable Review of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2011) ,” p. 7.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正主义/维持现状是一种流行的两分法，如施韦勒划分了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但是，这样一种两分法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及其所缔结的联盟的意图是难以观察的，研究者只能根据行为特征来判定某一国家或联盟的意图，但是这种判定本身存在着很强的价值判断或循环论证的色彩。实际上，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美国都具有强烈的修正主义色彩。^① 由于美国将获取和维持自身霸权作为首要目标，扩张和使用武力成为其对外行为中的持久特征，很难说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联盟相对于共产主义联盟具有维持现状的特征。

四 结语

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东亚地区的联盟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安全同盟成为仅存的联盟体系。“美国亚太联盟自北向南包括美韩、美日、美泰、美菲、美澳五组条约联盟，分属东北亚、东南亚与大洋洲，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区资源。”^② 伴随美国重返亚太，美国通过军队部署、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强化其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的联盟关系。同时，美国还加强了与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安全伙伴的关系。

与不断强化同盟友关系的美国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一直实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冷战初期中苏不成功的结盟经历是中国不结盟的原因之一。但是，结盟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手段，不应被排除于国家的战略选择之外。当前，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重返亚太的安全压力，而且周边国家不断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起争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为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考虑，我国应随着时间和国家利益的

^① 韦宗友通过对“修正主义国家”概念和指标的界定，认为美国“表现出较强的修正主义国家倾向”，参见韦宗友《解读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指标及涵义》，《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第13—19页。

^② 凌胜利《冷战后美国亚太同盟的强化：趋势与问题》，《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2月，第129页。

变化适时调整当前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此外，书中的核心观点对于理解当前东亚联盟政治与地区冲突之间的关系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是因为，当前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等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在强化联盟内部协调性、保持凝聚力的同时，也面临管理盟友的难题。在盟友可能卷入冲突的情况下，美国不仅要发出保护盟友的信号，也必须防止这些盟友借助自己的保护承诺发出挑衅，从而让美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中。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表现出了管理盟友的意愿，表明美国不愿意让自己的联盟义务和承诺变成对盟友挑衅行为的支持。应该说，当前东亚地区联盟政治发展的新态势也为我们检验和发展联盟政治理论提供了契机。